

中国文化的 现代转型

zhōngguó wénhuà · de
xiàndài zhuǎnxíng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主编

中国文化的 现代转型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主编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ISBN 7-5351-1858-5

I. 中...

II. 湖...

III. 传统文化-转换-现代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899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9.25 印张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445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ISBN 7-5351-1858-5/G·1505

定价:24.7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编者前言

近年来,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围绕中国社会及文化转型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晚清经世实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等课题的研讨。在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邀约武汉、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海外部分知名学者提供了相关论文,结集为这部论文集,意在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程及规律开展更为广泛的研讨。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1995年4月

目 录

序.....	冯天瑜(1)
--------	--------

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	汤一介(9)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周积明(38)
鸦片战争前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延误	周积明(62)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周积明(82)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中国近代化历程.....	丁守和(110)

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	冯天瑜(125)
元典的“穷变通久”与近代的“更法自强”.....	冯天瑜(139)
近代民主思潮的民族文化渊源.....	冯天瑜(155)
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	欧阳哲生(177)
元典精神与“文明悖论”的克服.....	冯天瑜(202)

文化转型初期中国士人对西学的价值取向.....	邓建华(219)
《俱分进化论》的近代忧患意识.....	章开沅(233)
乾嘉学术中的知性精神	
——戴震、章学诚思想片论	许苏民(248)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	萧致治(265)

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	刘泽华(283)
清初非君思潮与近代民主运动·····	范正宇(294)
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世转型·····	陈 钧(301)
晚清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萌发及其影响·····	朱 英(324)
晚清城市文明转型初探·····	皮明麻(344)
文化转型与民俗传统的嬗变·····	萧 放(358)
戊戌不缠足运动的文化透视·····	钟 年(370)
张之洞在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冯天瑜 何晓明(390)
张之洞的文化人格·····	何晓明(409)
“抽象的感性”下的变革论者	
——以康有为为例的精神现象学式之哲学解析	
·····	林安梧(423)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李华兴(443)
严复与近代思想启蒙·····	何晓明(462)
精英人物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郭 莹(477)
现代中西文化与文化理论之互动趋向·····	陈启云(494)
现代儒学思潮的贡献与思想特征·····	郭齐勇(528)
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论·····	郭齐勇(548)
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论略·····	何晓明(562)
论中国及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理性主义文化	
·····	姜义华(574)
“文明冲突决定论”辨析 ·····	冯天瑜(588)
论文索引(1980——1993年) ·····	陈利媛(597)
作者简介 ·····	(610)

序

冯天瑜

—

不同时代的人们立足于各自所处的“当下”，将无限悠长、深远的时间之流划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而形成各自的“古今观”。清人段玉裁说：

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

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①

由“古”向“今”的转换，是每一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的问题。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商君书》将历史区别为“上世”（约指西周时期）、“中世”（约指春秋时期）、“下世”（约指战国时期），并作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②的判断，从而揭示出价值重心和文化取向的古今演绎。汉代司马迁曾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确立一个宏阔的目标——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

其中，“通古今之变”便是考察历史进程的规律，也可以说是研讨

①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② 《商君书·开塞》。

③ 《汉书·司马迁传》。

当年历史及文化的古今转换。

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题目，它既与运作已久的“古今之辨”一脉相承，同时又包蕴着丰富的新内涵。简言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发生着文化的局部性量变，那么，“文化转型期”则指文化发生全局性质变的阶段。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生命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征服自然”所需要的“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变迁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所享有。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二

从全球范围观之，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是以十五、十六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

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其文化标志；这一转型的大规模展开则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是启蒙运动。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播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欧洲而言，发端于15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为“内发自主型”。对于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则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欧洲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其现代化呈“外发次生型”。

欧洲以外地区（严格意义上应是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过程，又大略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人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文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与加拿大）和澳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访问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都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另一种类型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越南、朝鲜、日本，都有着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及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还要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这两者间虽不乏统一性，却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段相互矛

盾、彼此牴牾。对于此类“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不可失察。曾经颇有影响的“民族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或固守内因一隅，或偏执外因一端，都不能全面、深刻地诠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

三

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人们一般以 19 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也即西方资本主义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为其端绪，这是大体不错的。但如果从外因与内因相统合的高度加以观照，从中国历史的纵深度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自明代中叶（16 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已隐然呈现走出中世纪的某些征兆，如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还包括晋东南等少数北方地区），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渐成规模，出现某种从“农本”向“重商”转化的苗头。与之相伴生，在观念领域，初露“破块启蒙”的动向，诸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君王的抨击，对君臣之间从主奴依附向平等同事关系转化的期望，对学校议政、“工商皆本”的热烈倡导，都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迫近。此外，方鹏、归有光、毛奇龄、俞正燮等人对戕害女性的“节烈观”的批判^①，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深沉谴责^②，也有类似意味。即使是清学的主潮——乾嘉考据学，虽然弥漫着古典气息，但其间洋溢着的理性—实证精神，将“神圣”的经书还原为历史典籍的努力，其对经学传统的解构作用，也为观念文化的转换准备着条件。

① 见方鹏《新亭存稿·风俗》、归有光《贞女论》、毛奇龄《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俞正燮《贞女说》。

② 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中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固然出现了某些时隐时显的新文化因子,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达到转型阶段,缺乏强劲的经济—政治助力,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和力度都远不足以掀起大波;社会上出现的某些“走出中世纪”的动向,也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在状态。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仍然徘徊在中古故道,中国尚自外于15、16世纪以来已经开始的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典型表现便是1793年(约与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同时)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勋爵所显示的“集体孤独症”^①,尤其是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的复信所宣称的“天朝德威远被”“无所不有”^②,生动地表明,已经落后了的中国人当时还自认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③。这种情形迁延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炮舰、鸦片和商品打破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为基石的中国社会逐步被纳入世界统一市场,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开始与风靡全球的西方近代文化相交会,这样,中华传统文化在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时刻,便因遭遇到外来的近代文化的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陈寅恪称其为“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此语表达了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空前激变性和复杂性。

四

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打断中华文化自身进程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向人体移植器官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现代文

①②③ 见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

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激盪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组矛盾。中国学界、政坛自19世纪末叶开始，直至20世纪80、90年代仍然聚讼纷纭的“体用之辨”，正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时代性转换与民族性维系之间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反映。

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其原因是中国人经历的这一转型过程，较之西方人，存在一个“时间差”，以至西方人数百年间解决的问题，一齐积压到一个世纪间，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一方面，今之中国人要完成西方人18、19世纪已经完成的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过程，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化；另一方面，本世纪以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气化和电子技术导致的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西方诸国已步入后工业时代（或称“后现代”），随之出现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现代化浪潮对整个“地球村”的冲击，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中国人当然不能自外其身。置此之际的中国人可谓利弊双收——既可以从后工业文明直接借鉴最新成就，不必亦步亦趋地走西方人曾经走过的工业化老路，从而获得“超前效应”，但与此同时，还不“发达”的中国人也难以避免发达国家的种种“现代病”，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导致的道德危机、信念失落，等等，而不得不寻觅救治之策。因此，今之中国现代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中西古今”的层累式积淀，呈现“多重”性状，使中国人不易从容应对。

早在1919年，鲁迅便描述过现代中国的“多重”性状，今日读来仍有切肤之感：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

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①

有着宏阔世界眼光的孙中山，也对近世中国的“多重”任务深有体悟。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热烈倡导者，同时又深悉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故力求中国在资本主义“祸害”“未萌之际”便加以防范。他1905年撰写的《〈民报〉发刊词》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就是试图对现代中国面临的“多重”问题作一总体式解决。这一构思当然包含着主观空想成分，缺乏可操作性，却又蕴蓄远见，富于创识和预见，对面临类似问题的今之国人，仍颇具启迪意味，并提供了宝贵的思维教训。

五

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转型，是亿万中国民众在长达三个世纪间经历着的伟大社会实践。纵观这一起伏跌宕的过程，仅就观念文化的转变而言，有几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一为明清之际（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继之隐遁，却又如地火潜行；二为清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30至60年代），外患内忧的刺激，使得经世实学和今文经学勃发，构成传统文化走向近世新学的桥梁；三为清同治及光绪前中期（19世纪60至90年代），随着“洋务新政”的拓展，西学输入渐成规模，新教育雏形初现，早期改良思潮由孕育而兴盛；四为清末至五四，发端于甲午战败激起的国人觉醒，又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世新学形成、发展，并渐成主潮，新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走上历史舞台；

^① 《热风·五十四》。

五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大潮使现代化进程赢得加速度,并与世界接轨,观念文化逐步寻觅到时代性进步和民族性发扬相统一的路径,中国现代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围绕中国社会及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的追寻,武汉几所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人文学者在 80 年代中期曾举行过系列讨论,其文字结集为《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此后十年间,参加讨论者的研究工作各有拓展,但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关注却未曾稍减。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在本所研究的基础上,邀约海内外学者组编了这部论文集,体现了这一领域中研究的深入,而无论是反省过去还是开拓未来,笔者相信,这一课题的研究总是富于学术生命力的。

1995 年 4 月 14 日于武昌珞珈山麓

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 发展

汤一介

讨论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似乎首先应弄清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说,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往往有“认同”和“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谓“离异”的阶段即文化的转型时期。一般说来,文化转型时期是指在某一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地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速的重组与更新。在中国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情况最为明显,而这三个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文化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者作用来实现。“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

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派、文化的自由主义派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派。这里我们使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仅仅是就其对过

去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说的，并无其他意义，因此对这三派都不包含褒或者贬的意思。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而我们往往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发展的。这一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是值得我们再重新探讨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一历史的考察以了解它的现实意义。

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221)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周平王东迁后周王朝势渐衰微，诸侯竞起，战争不断，文化也发生了危机。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儒、道、墨、名、法、阴阳等家相继出现，其中儒、道、法三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到汉朝，墨家和名家的影响渐消(至东汉末“名家”思想曾有所抬头)，而阴阳家思想又渐为儒家所吸收。据此，或可认为儒家在先秦代表着保守主义派，道家代表着自由主义派，法家代表着激进主义派。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要是孔子和孟子)是以维护西周以来的传统为己任，所以我们说他们代表保守主义派。孔子认为，当时是一“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礼被破坏了，应该恢复周礼的权威，他并以此为为己任，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用我治国，我将在东方复兴周礼。他一生奔波，就是为了继承文王、周公的事业，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①虽然孔子也并非要现实社会一成不变，如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

① 《中庸》。

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虽然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有“因”和“革”，但孔子认为对传统只能是“继往开来”，决不能丢掉传统，所以他主张要很好地保存古代文化，他说 he 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教学生的内容也多是“诗”、“书”、“礼”、“乐”等等传统文化。由于孔子这种对传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他被讥笑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孟子一生的志愿，就是学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②他称颂“尧舜之治”，主张“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见，他以继承孔子所致力保存传统文化为己任，并被当时人视为“迂阔”，就这些方面看孟子和孔子一样应属于当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

在这里我们需要作一点说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并非一味守旧，而是要维护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为文化的发展找出一条不被打断的出路。同样，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不等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更不能认为它们对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阻力。先秦儒家思想虽然不能全然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形势，但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世的正面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守态度，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守护者而为后世所称颂。

先秦道家作为当时自由主义派的代表，如果说在老子那里这种倾向尚不显著，那么在庄子思想中则是十分明显了。老子虽

① 《论语·为政》。

② 《孟子·公孙丑上》。